杨春时 / 著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

[illegible]文化出版社

杨春时 著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杨春时　著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1
ISBN 7-80105-428-9
Ⅰ.现…　Ⅱ.杨…　Ⅲ.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96238 号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

作　　者：杨春时
责任编辑：李　明
封面设计：艳春霞
出　　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印　　刷：北京南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大 32 开
　　6.4 印张　18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01-3000 册
书　　号：ISBN 7-80105-428-9/I·431
定　　价：2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1)

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1)
2　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9)
3　现代性与中国人格模式(15)

第二章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转型(19)

1　中国政治文化模式之演进(19)
2　中国道德的现代转型(28)
3　文化转型中超越层面的缺失及其代价(35)

第三章　现代性与中国文化思潮(43)

1 自由主义之命运(43)
2 保守主义的兴衰(52)
3 从民族主义到国家主义(58)
4 从科学主义到意识形态主义(68)
5 从平民主义到民粹主义(77)

第四章 现代性与中国哲学(86)

1 中国哲学的失落与重建(86)
2 超越实践哲学,走向现代哲学(96)

第五章 现代性与中国美学(106)

1 关于审美现代性(106)
2 中华美学的古典主体间性(114)
3 超越实践美学,走向后实践美学(125)

第六章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137)

1 文学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137)
2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145)
3 文学理论: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153)

第七章 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166)

1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焦虑(166)
2 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寻根(17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

3 中国知识分子的四种类型(184)

第八章 当代文化思潮批判(189)

1 新保守主义和新理性主义批判(189)
2 “现代性批判”的批判(195)

第一章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

1.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现代性的论述相当歧异。其原因除了个体思想的差异外，主要在于对现代性的着眼点不同。例如，康德认为启蒙（与现代性等价）是“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实际上是指理性和主体性；韦伯认为现代性是“祛魅”即神圣的世俗化过程；而舍勒则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精神气质，即“怨恨”心态。可以看出，这些关于现代性的界定是在不同层面作出的；虽然各有根据，但也缺乏对现代性的总体把握。因此，在总体上把握现代性，即揭示现代性的整体结构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对于西方现代性的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按照福科的说法，现代性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态度”：“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自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① 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

① 福科《什么是启蒙》，引自《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 年，第 430 页。

的精神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这与人类一般精神的三个层面是一致的。无论是西方的现代性，还是中国的现代性，都是在这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现代性不是其中某一个层面，而是三个层面的整体结构。人类精神的分化是现代性的历史过程。欧洲传统社会（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世俗的时代，人的感性和理性都受到神学的压制，未获独立。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宗教统治瓦解，神圣与世俗分离，感性和理性也冲破宗教蒙昧而独立，同时也产生了对感性和理性的反思和超越（哲学、艺术等）。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祛魅”和“诸神不和”。

在现代性的感性层面上，存在着被释放出来的人类生存欲望，它是现代性的深层动力。中世纪的宗教禁欲主义禁锢感性欲望，而在文艺复兴后感性、自然得到肯定，并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对这一点的认同，形成了多种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恶即物质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它在传统社会受到抑制；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得到刺激而膨胀起来，从而以生产力冲破生产关系的形式得到解放。简言之，现代性源于人的贪欲，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松巴特认为，资本主义起源于以奢侈生活原则为基础的高度世俗化的性文化，它直接促进了商品生产，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出现。① 而舍勒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怨恨”心态：“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中进步向前的，并不是实干精神，不是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不是‘具有王者气度的商人’和组织者，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充满惊惧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松巴特恰到好处地描绘的新市民德行和价值体系。”② 这与他认为现代性是“本能造反逻各斯”相一致。马克思和松巴特都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定位于感性欲望，只不过前者是物质欲望，后者是

---

① 参阅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75 页。

② 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刘小枫编，罗悌伦等译，香港牛津大学 1995 年版，第 15 页。

性欲望，这正应了一句老话“食色性也”。而舍勒也强调现代性是一种感性心态，所谓怨恨仍然源于人的欲望不能满足，在社会竞争中劣势人群就会产生这种心态。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类有两种原始冲动即性欲和攻击性，松巴特强调了前者，舍勒强调了后者。总之，现代性不过是被解放的感性欲望，即舍勒所说的“系统的冲动造反”。欧洲现代性发源于文艺复兴运动，而它最先是以感性、自然反抗宗教禁欲主义。而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的动力仍然是物质消费和感官享乐欲望，这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一种感性异化。

人的欲望的解放必然体现为理性层面上来，被理性所肯定，现代性也就体现为一种理性精神。因此，当我们说现代性时，一般可以表述为理性精神。中世纪神学在禁锢人的感性欲望的同时，也以盲目的信仰否定人类理性，因而在文艺复兴的感性解放之后，启蒙运动又以理性取代了神性的权威，这就是完整的世俗化的“祛魅”过程。理性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理性），科学精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人文精神（以个体价值为核心）促进了民主制度的建立，理性精神推动着西方走向现代社会。康德确立了以理性为根据的主体性，即人为自然立法和道德的绝对命令。黑格尔以理念作为历史的本质，而理念不过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社会学领域，卢梭提出了基于平等的民主理念，孟德斯鸠提出了基于自由的民主理念。理性权威取代了上帝的权威，在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同时也造成了理性异化，科学主义导致技术对人的统治和生存环境的恶化；世俗化的自由导致精神的空虚和生存意义的虚无化。

世俗化导致宗教统治的瓦解，也造成了人的沦落，“上帝死了”，人沦落为感性或理性的存在物，失去了神性，也失去了存在的终极根据。而人是一种超越性的存在，具有神性，它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并追求终极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就有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这就是说，现代性还存在着自我批判、自我超越的层面，包括哲学现代性、审美和艺术现代性等。之所以要超越感性和理性的现代性，是因为它并不是自由本身。无论科学、民主还是物质需求，都不能取代人

的自由。而且，现代性往往要以牺牲人的自由作为代价。科学主义把人变成技术奴隶，民主制度把人平均化、组织化，消费主义把人变成消费动物，而自由却像浮士德的灵魂一样被出让了。现代哲学承担了反思现代性、为现代人恢复自我意识的任务，它对现代化带来的异化，包括感性层面的异化和理性层面的异化进行了批判。尼采对理性异化（奴隶的道德）进行了抗争；而存在主义则否定现实存在而诉诸超越性的存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整个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审美和艺术现代性则负起了在现代性重压下恢复人的自由的责任。现代审美和艺术（现代主义）以其对现实的超越抗拒了世俗化，恢复了人的神性。

中国现代性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具有现代性的一般性质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源于脱神人俗的话，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则源于脱圣入俗。中国传统精神和文化具有圣化倾向，不是宗教而是儒教即圣人之教统摄了感性和理性，这就是所谓的“内在的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具有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性质，它未发生超验的形上层面与经验的形下层面的分化。儒家学说是“道不离伦常日用”的“实用理性”文化，它把天道、天理转化为人道、人伦，既作为一套意识形态，又包含着宗教、哲学、美学等形上意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双重整合功能，即规范人们的现实行为，又在现实世界给人们找到了终极价值。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冲击导致了传统文化的衰落；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性反对中国传统文化，更加剧了传统文化的瓦解，从而诞生了中国的现代性。在科学、民主的冲击下，儒学权威瓦解，中国文化失去了圣化的品格，沦落为凡俗文化。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传统变成了天人二分和体用分离，有了感性和理性的对立，同时也产生了超越的冲动。中国现代性也就分化为感性、理性和超越性的层面。但它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在以后的社会革命运动中，现代性运动发生了逆转，即迫于救亡的紧迫性不得不走上了以反（西方）现代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而这种逆转也有中国现代性本身的原因。因此，我们应当对中国现代性本身进行总体的分析。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感性层面的现代性并没有突出地体现为感性欲望的解放。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对感性欲望的禁锢与西方宗教的禁欲主义不同，它虽然强调以理性节制感性，重义利之辨，但又讲求中庸之道，承认“食色，性也”，给感性留下一定的空间。因此，这是一种软性的禁锢。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特性，感性现代性的反弹就不那么强烈。虽然五四也有个性解放的呼声，但只是少数人的声音。另一方面，落后的、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没有提供商品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因此个体感性发展的空间受限，它只停留于求生存的水平上，发财的欲望并没有那样强烈。但中国的“怨恨”心态却特别强烈，具有很强的攻击性。这是由于中国的现代性是由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华民族饱受屈辱，对帝国主义和腐败无能的政府有强烈的仇恨。同时，由于极度贫困，阶级关系紧张，而产生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因此，中国的怨恨与西方不同，它不是表现为个体生存竞争，而是表现为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也就是说，它带有集体性，体现为民族的怨恨和阶级的怨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得到顺利发展而中国的现代革命持续那么久、表现得那么激烈残酷的原因。建国以后，应该给个体欲望的发展留下空间（发展生产力），并使生存性的怨恨转化为个体竞争的动力（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但集体性的怨恨具有强大的惯性，成为“左”的思潮的渊源；更由于体制内积存的新的怨恨——由于政治身份的不平等和对“革命”政治身份的争夺，产生了新的集体性的怨恨，而后终于爆发了“文革”。“文革”的起因非止一端，但其深层心理动因在于这种新的集体性怨恨。没有这个心理动因，任何人也无法把群众动员起来。

中国现代性的理性层面就是五四引进的科学和民主，这是价值理性在政治领域的体现，但它与西方也有所不同。由于感性欲望没有充分解放，因此工具理性的动力不足，科学精神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虽然五四时期科学主义一度建立了权威，但这个科学主要不是指向自然科学，而是指向社会科学，而且由于对进化论的偏颇理解，科学主义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五四退潮后，由于意识形态被当作科学接受，科学主义很快就转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为意识形态主义。在五四以后的革命进程中，不是科学精神而是意识形态主义成为主导。此外，就价值理性而言，基于集体怨恨心态，不是自由而是平等成为基本的现代性诉求。有两种民主，一种是基于平等的民主，一种是基于自由的民主。前一种民主是卢梭的理念，它导致法国革命模式和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后一种是孟德斯鸠的理念，它导致英国革命模式和“自由民主”制度。中国革命接受了卢梭的理念，采用了法、俄革命的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制度，原因即在于此。建国后，本应重建和发展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尤其应重视人的自由，但意识形态主义的惯性和平等理念的影响阻碍了这种现代性建设，而且成为这种现代性建设的反动力量。“文革”是这种倾向的极端化表现，是现代性的全面反动，所谓“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反对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以意识形态主义反对科学精神（如所谓“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意识和平等理念反对个体自由。

中国现代性也有超越层面。脱圣入俗的结果，是形上领域的空白。五四打倒孔子的权威，消除了传统文化的圣化光圈，在批判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同时，也取消了中国文化的超越功能。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但对西方文化的引进是不全面的，仅限于科学和民主，而科学和民主都是形下层面的文化，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以及审美文化等形上层面的文化则被忽略甚至被拒斥。因此中国现代性一开始就具有片面性，存在形上层面缺失的问题。五四对宗教持批判态度，把它与迷信等同。20 世纪 20 年代初，五四主将们发动了一场反宗教运动，使用的武器仍然是科学。这是以经验反对超验、以知识反对信仰的运动，它导致信仰的缺乏，从而为意识形态的信仰化创造了条件。五四不重视形上哲学，因为它不能直接发挥启蒙作用；更由于科学主义的霸权，形上哲学受到排斥。被引进提倡的是带有实用主义倾向的杜威的实验主义和实践性的马克思主义。1923 年发生了“科玄论战”。这场论战表面上是进步与保守之争，实际上也是科学能否取代哲学的论争。这场论战以“科学神”战胜“玄学鬼”而告终，表明形上哲学在中国的缺场。主流哲学是实践化的，哲学沦为一种意识形

态，哲学的反思、批判功能丧失，导致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霸权，并在以后发生偏执化。五四对现代文学的引进和建设也着眼于启蒙作用，忽视文学的审美超越品格。五四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更接受了苏俄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抹杀文学的超越性。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就不可避免地论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从而丧失了超越功能，这导致人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彻底地政治化。宗教、哲学和艺术被黑格尔确定为绝对精神自我复归的三种形式，实际上是人类精神的反思－超越层面。它们在中国的缺场，意味着中国引进的现代性是片面的现代性，它缺少形上的层面和反思、超越的能力。现代性需要一种制约，包括哲学的反思、批判和审美、艺术的消解、超越，甚至也需要宗教的超越，否则就会导致现代性的偏颇。中国现代性正是由于缺乏形上层面而片面化，最后导致现代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它丧失了对意识形态的反思、批判能力，导致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它失去了对现实的超越功能，使人们丧失了自由的意识。更严重的是，片面的现代性并没有消除现代人的形上冲动，反而把这种冲动引向意识形态狂热。由于人们的形上冲动失去了正常的实现途径，就只能以反常的途径实现。五四以后，苏俄的革命意识形态被接受，这是由于它适应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它包含着某种终极追求，即建立人间天堂的理想，从而成为一种信仰。这就构成了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文化。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著文道：布尔什维主义“在今日的俄国有一种宗教的权威，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运动所风靡”。①正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信仰化，才引导和发动广大群众包括知识分子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并获得了胜利。同时，意识形态的信仰化也由于失去了反思和超越的制约力量而导致偏执化，这在建国后显现出来，形成“左”的思潮，引发了“文革”运动。

---

① 李大钊《Bolshevism 的胜利》，转引自《文学运动史料选》，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1 页。

“文革”结束后，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个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感性、理性和超越性三个层面克服现代性的片面性，全面建设现代性。只有从这个高度来看问题，才能深刻理解这个时代的性质。

在感性层面建设现代性，意味着解放人的感性。这就必须通过发展市场经济和改造社会关系，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一切生活需求，解放现代化的原动力。这就要求克服传统的“重义轻利”思想，改造压制个体欲望的意识形态。同时把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怨恨”心态引向合理的方向，即由集体性的怨恨变成个体性的“怨恨”，从而成为社会竞争的原动力，而不再是社会冲突的渊源。

在理性层面建设现代性，就必须重新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要清除意识形态主义的影响，恢复科学精神。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这个时候最容易产生新的“平等的民主”要求，并导致现代性的反动。因此在注意社会公平的同时，更要注重培植自由意识，克服片面的平等理念，建设自由基础上的民主。

在反思－超越层面建设现代性，意味着哲学、文学、艺术等的现代转型。现代性的负面影响包括感性异化和理性异化将日益突出，要求哲学的反思、批判和文艺的消解、超越。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人的信仰失落，造成新的信仰真空，更要求为人们提供终极价值。当代中国哲学和文艺应当进行现代变革，负起建设反思－超越层面现代性的任务。针对现行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实践化、形上哲学缺场的问题，应当变实践哲学为形上哲学，把哲学与意识形态或历史科学分开，确立哲学的反思品格。同时，针对中国文艺尚未走出前现代阶段以及曾长期沦为意识形态附属品的状况，应当发展现代文学、艺术，包括纯文艺与通俗文艺，改变文艺的意识形态附属品的地位，发挥文艺的审美超越功能，实现“以审美代宗教”的理想。而且，在现代性进程中，宗教并没有完全丧失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它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代性的制约、平衡力量。西方现代性在战胜了宗教统治后，宗教从世俗领域退回到信仰领域，从而与现代性相协调。尽管宗教的影响大大削弱，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感性和理性的

偏颇，为现代人留下一块精神家园。中国宗教传统薄弱，但随着现代性的来临，也会有更多的人到宗教中寻求精神的避难所。如何协调宗教与现代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2. 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

现代性本是西方的产物，但经由全球化正迅速成为普遍的社会发展趋向。近年来，在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中，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问题成为焦点。汪晖等人提出了中国现代性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命题。“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是事实陈述，没有什么问题，但称之为“中国现代性”则成了问题。汪晖等人的逻辑是，毛泽东以反西方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方式，完成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因此这也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这就提出了现代性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汪晖等人的失误不仅在于把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对立起来，造成了逻辑上的矛盾，更在于简单地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等同于完成现代性，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尤其是忽略了中国的特殊国情：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回顾中国现代史，所谓“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应该解读为“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民族国家”，而现代性自身则没有完成。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奥秘之所在。

什么是现代性？尽管众说纷纭，但最基本的内涵是一种现代理性精神，包括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这一点，应当没有大的疑问。现代性发源于欧洲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现代理性精神展开两翼，带动西方脱离古典时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产生现代性的土壤，无论是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家文化，都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儒家的人文精神是集体理性，而不是个体理性），因此现代性无从发生。中国现代性是由西方引进的，不是土生土长的。因此，现代性只是西方文化的特产，所谓“反西方现代性

的现代性”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

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它区别于传统社会的王朝国家。欧洲中世纪建立了许多王朝国家，它并不是建立在民族地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是民族共同体，而只代表君主、贵族、教会利益，它的合法性根据是神意。近代兴起了民族国家，它建立在民族地域、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基础上，成为民族共同体，代表了民族利益，它的合法性根据是民族公意。这只有在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下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中国传统社会也是王朝国家，虽然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形成的，但不能算作现代民族国家。它以天命的名义进行统治，是一人一姓之天下，而非民族的国家。而且，在华夏中心主义世界观支配下，还没有民族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尚未觉醒。中国人尚未发现世界，因而也没有了解自身。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在“天朝”被西方列强打败，发现了世界，并开始争取民族独立后开始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欧洲，先是王权摆脱教会控制，形成独立民族国家（如法国路易十四王朝），然后才有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推翻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也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的长期过程，1949 年建国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而以后的现代化建设应看作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延续过程。

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方面，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现代性的核心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是民族主义，因此二者既相关联，又可能不同位。在欧洲，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基本上一致，它们都反对共同的敌人——教会和封建贵族，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民族主义不相冲突，甚至相辅相成。而在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错位，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可能与民族主义相冲突，这种错位和冲突造成了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艰难曲折、漫长迂回。

中国现代性是“外发型”的，也就是说，它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要求，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提出来的（外迫性）；它不是来自中国本土文化传统，而是来自西方（外源性）。外迫性，造成了中国的

民族主义，它要调动一切传统文化资源反对西方列强，争取民族独立。外源性，使中国现代性事实上等同于西化。这就形成了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要民族独立，就要反西方；要现代性，就要学习西方。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任务面前，现代民族国家更紧迫，更重要。在矛盾的抉择面前，中国人民选择了现代民族国家，而牺牲了现代性。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灭亡中国的威胁下，只能速起救亡，现代性一开始是作为救亡手段被提出来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启蒙是为救亡服务的。这与西方正好相反。欧洲现代性是由社会自身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没有救亡的压力，它的思想资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因此与现代民族国家没有冲突；而且，现代性是根本目的，现代民族国家是实现现代性的手段，二者的关系没有被颠倒过来。

现代性既然只是救亡手段，是为现代民族国家服务的，因此这个手段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只要能救亡，不管是现代性还是反现代性，都可以用。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先用学习现代性方式，后又用反现代性方式，因此才有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迂回。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意识到要学习西方现代性，一开始是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兴起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败在后崛起的东方小国日本手中。于是，中国又开始学习西方政治制度，搞变法、搞革命。结果帝制推翻、共和建立，只是虚有其表，骨子里还是封建专制。再接着就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精神文明，提倡科学、民主，这正是现代性的精髓。同时全面批判传统文化，以造就新国民性。启蒙运动才持续数年，民族危机加深，国亡无日，以现代性启蒙救国，远水不救近火。于是救亡压倒启蒙，启蒙运动中止，革命运动开始。

“五四”以后，中国开始背离了以现代性救亡的道路。走上了“反西方现代性”救亡的道路，首先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新青年》同人曾约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致力于启蒙。但未过几年，陈独秀、李大钊、鲁讯等就投向社会革命。他们违背初衷，正是由于救亡任务的急迫而别无选择，也证明了中国现代性对于现代民族国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